

《诗经》异文简论

张树波

异文既是一个校勘学术语，也是一个文字学术语，《诗经》异文属于前者而义兼后者，是指《诗经》305篇原文，在不同传本中，或被各类著作引用中，所出现的文字上的互异。以《诗经·卫风·淇奥》“赫兮咺兮”句中的“咺”字为例。咺音宣，毛《诗》如字作咺，鲁《诗》作烜，齐《诗》作喧，韩《诗》作宣又作愴。对于毛《诗》的咺字来讲，烜、喧、宣、愴是异文。对于韩《诗》的宣字和愴字来讲，咺、烜、喧是异文。鲁《诗》齐《诗》亦然。韩《诗》自身的宣和愴，也是异文关系。在《诗经》305篇中，几乎篇篇有异文，许多篇还章章有异文，同一章中出现两对乃至数对异文者亦所在多有。这说明《诗经》异文研究作为《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个带有很大普遍性的问题。

异文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个文字使用问题。《诗经》异文作为一种很普遍的文字现象，是在我国唐代以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在《诗经》被长期传抄刻写和引用过程中产生和繁衍起来的。对于《诗经》异文的研究，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唐以前古人用字习惯、方式和规律的研究，是对《诗经》用字规律和本字本义的研究。前人特别是清代学者在《诗经》异文研究方面已作大量工作，也撰写出一批研究专著。但前人的工作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异文本身的调查清理和记录解释阶段，基本上没有作宏观上的研究和规律性方面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些探索和尝试，就《诗经》异文产生繁衍的社会历史条件，《诗经》异文诸类型及其存在形态，《诗经》异文研究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等问题，提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看法。

《诗经》异文的产生和繁衍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创作于西周初期至东周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其间包括流传加工、采献合乐、编辑成书三个阶段。考察《诗经》异文的产生,就应从分析这个创作成书过程开始。因为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趋同和滋异辩证统一的过程。在流传加工阶段,承传者们的加工,使口头流形态的民歌不断得到提高,但同时也产生着加工民歌和未加工民歌的差异,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承传者加工本身也意味着差异。在采献合乐阶段,朝廷乐官们对采集来的民歌和献上来的文人诗,进行“雅言化”和“诗合乐”的工作,使采献之诗更加符合周代“官话”,适合歌唱和舞蹈,走向完善和统一,但同时也产生采集加工诗和未采集加工诗的差异,而未被采集加工的诗势必还在社会上流行。在编辑成书阶段,编辑整理者们的加工,使诗三百真正成为一本书,其完善统一之功更不可没,但同时又产生编辑整理者们加工过的诗和原有乐官加工诗的差异。由此可见,对于《诗经》中的诗来说,贯穿整个创作成书过程的这三个阶段,是三次大加工、大提高,同时也是产生差异的三个新机会。如果借用今天的概念来说,那么这些差异是带有版本性质和异文性质的。由于这些差异与民间社会紧密相联,又由于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学有传承性,这些差异必然影响到后世《诗经》异文的产生和繁衍。

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诗经》中的诗在变革中实现了与乐的分离,由原来所处的乐的附庸地位,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诗经》由乐歌集变成歌词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总集,并进而成为重要教科书,成为社会交际工具,到汉代更被儒家尊为一经。《诗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所学习、所研究、所传抄、所引用,于是便进入了异文繁衍的新阶段。综合分析这个新阶段中《诗经》异文大量繁衍的社会历史条件或曰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

面:

一、文字本身孳乳演变方面的原因

《诗经》创作成书时代,汉字数量还比较少,书中不少用字是“身兼数职”的。为了解决这种问题,随着汉字孳乳繁衍,陆续创造出许多晚出新字,大量的同音字或异体字。以后《诗经》的各种传本或引用《诗经》的各类著作,有的使用当初“身兼数职”的古字,有的使用适应需要创造的新字,或分别使用了不同形体的同音字或异体字,便造成大量异文产生。成书于春秋后期的《诗经》,最早定本用的是汉字大篆。以后经战国至秦汉,汉字形体又经历了由大篆到小篆又到隶书的演变过程,后世《诗经》的不同传本或引用《诗经》的不同著作,分别使用不同形体的字,也会形成异文。

二、古代承传者的文化素质和用字习惯方面的原因

这里说的古代承传者,主要是指汉唐间《诗经》的继承传播者,其中包括学习研究者,尤其是指传抄刻写者和引用者。我国雕版印刷《诗经》是在五代以后。隋唐以前,历代传本都是靠手传抄刻写。在此种情况下,抄写者的文化素质和用字习惯对书之用字影响极大。如有的喜欢用古体字以重其源,有的喜欢用晚近字以求其新,有的因为刻写费力喜欢用简笔字以轻其功,有的文化素质低、责任心差在书写中造成衍夺或误导,有的出于某种私人动机随手改字任意造字,这些都意味着《诗经》异文的大量繁衍。在唐以前靠手传抄刻写条件下,古书传本少而珍贵,学习者得书困难,主要靠听先生口授,靠耳治。长期重用耳治的结果,使当时读书人养成更加重视字音的学习习惯,并进而形成“以声托事”的用字习惯和方式。所谓“以声托事”,就是在记录或引用《诗经》原文时,不太强调使用本字,而是顺手变通借用别的同音字或近音字。这也是促成《诗经》异文繁衍的重要原因。

三、学术流派师承家法方面的原因

汉代诗学分为今文、古文两大派,鲁齐韩毛四大家。而在鲁齐韩三大家中,又各自分为一些小的流派。这些流派都有自己严密的师承关系和传授体系,师法家法亦很严谨。流派盛行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家法严谨对于培养尊师重学优良学风也有好处。但过于重师承、守家法也有弊病。陈乔枬在《齐诗遗说考·自序》中说:“汉儒治经,最重家法,学官所立,经生递传,专门命氏,咸自名家,三百余年,显于儒林,虽《诗》分为四,《春秋》分为五,文字或异,训义固殊,要皆各守师法,持之弗失,宁固而不肯少变。”在当时各家传本主要靠口耳授受,人工抄写,用字极易走形变样的情况下,这种“各守师法,持之弗失,宁固而不肯少变”的态度,就杜绝了交流的机会,堵塞了趋同的渠道,凝固了彼此的差异,助长了异文的繁衍。虽然汉代以后经学发展又有趋同之势,但其对《诗经》异文繁衍的影响已经不可逆转。

四、不同地区方言俗语影响的原因

《诗经》所由产生的地域非常广,仅《国风》就来自十五个诸侯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方言俗语,这必然反映在《诗经》的创作中。虽然正如我们在前边所说,在《诗经》的采集加工阶段曾经乐官作过“雅言化”的工作,但这并不可能完全消除方言方音的影响。就是已经雅言化了的用字,在以后不同地域的传抄和引用中,也难免再受方俗殊语的影响。在《诗经》的传抄和引用中,同一个字,有的用了通语,有的用了方言,或者有的用了这个地域的方言,有的用了那个地域的方言,这样都会形成异文。

五、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

异文的载体是书,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因而社会的政治状况不可能不影响书流传的命运,并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书的异文是收敛还

是繁衍的问题。我们看近人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就知道我国古籍流传的命运与社会政治状况关系多么密切,由于社会政治原因造成的古籍大规模散失次数多么频繁,情况多么严重。每次大规模散失毁灭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下力气聚敛整理,这同时就意味着增加一次繁衍异文的机会。《诗经》也是如此。比如秦始皇焚书后,社会上长期见不到《诗经》的传本,到汉代人们便按照口头诵诵,用隶书进行记录整理。这次记录整理既是根据记忆,又是多头进行,其对《诗经》异文繁衍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说先秦是《诗经》异文的产生期,两汉至隋唐是它的繁衍期,那么到了两宋及其以后,则可以说是进入它的收敛期了。所谓收敛,意思是宋以后一般地(不是绝对地)说就不再制造新异文了。这主要是因为雕版印书发明并盛行起来,对异文起着调查清理作用的版本校勘发展起来,前边所说的促使《诗经》异文繁衍的条件基本上改变了,大多都消失了;而这时期经学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诗经》在人们心目中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心目中更加神圣起来,改动经文越来越被看作是严重的事情;加之有《唐石经》和历代监本作定本,不论是雕印传本还是引用经文,都有了统一标准和依据;因之《诗经》新异文的产生便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事情了。

《诗经》异文的基本类型及其存在形态

根据《诗经》异文不同的形成条件,和异文双方不同的内在本质联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各自不同的特点特征,我尝试着把全部《诗经》异文分析归纳为以下十四种基本类型:

一、同音通假型

由通假而形成的异文有五种类型,此为第一种,其特点是构成异文的双方是同音关系,两个字的声母韵母完全相同。《周南·穆

木》“南有樛木”，樛毛《诗》如字，韩《诗》作柎，成异文。樛与柎上古都是见母幽部字，声韵皆同，即属此型。

二、双声通假型

这是音近通假致异的两个类型之一，特点是构成异文的两个字声母相同而韵母不同。《邶风·燕燕》“瞻望弗及”，鲁齐韩毛四家《诗》皆如字作瞻，而不同于这四家中任何一家的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诗经》作章，瞻与章成异文。在上古，瞻为章母谈部字，章为章母阳部字，两字声同韵不同，属双声通假型。

三、叠韵通假型

此为音近通假致异的另一个类型，构成异文的两个字韵母相同而声母不同。《小雅·采芣》“有玼葱珩”，玼毛《诗》今传本如字，陆德明《毛诗释文》作创，玼与创是毛《诗》内部不同版本间形成的一对异文。玼、创二字上古声纽不同，一为清母，一为初母，而韵母相同，皆在阳部，明属叠韵通假。

四、同义通假型

如果说上述三种类型异文互异双方内在本质联系是在字音方面，那么这种类型异文互异双方内在本质联系则是在字义方面。就是说，构成异文的两个字是同义关系。两字是虚词的，是语法意义相同的关系；两字是实词的，是词汇意义相同的关系。《大雅·皇矣》“维此二国”，维毛《诗》如字，述鲁《诗》的《潜夫论》引作惟。维、惟在此都作句首助词，语法意义相同，即属虚词义通异文。《小雅·出车》“我出我车”，车毛《诗》如字，述鲁《诗》的《荀子》引作舆。车、舆都是名词，其词汇意义对言稍异散言则通，则属实词义通异文。

五、形省通假型

这是属于通假关系五类异文的最后一类，异文双方内在本质联系是在字形方面。如果我们把前三种通假称为音通，把第四种称为义通，那么这最后一种则可称为形通。

所谓形省，是指字形省略。通过字形省略实现通假，又由通假形成异文，故称形省通假型。形省通假的规律，一般是只取原有本字的声符作为借字，这种声符也是相对独立的字，且和本字保持着字音上的联系。《小雅·采芣》“玼玼之故”，毛《诗》如字作玼，述齐《诗》的《汉书》引作允。玼与允作为异文，就属此型。

六、今字关系型

古今字关系异文与通假关系异文有相似处，更有本质区别。相似处在于两种关系异文互异双方都存在着某种形音义联系；本质不同在于通假关系异文间的形音义联系产生于用字，带有偶然性和松散性，而古今字关系异文间的形音义联系产生于造字，带有传承性和紧密性。古今字关系异文的一方是古字，另一方是今字。《商颂·长发》“何天之龙”，何毛《诗》如字，《孔子家语》引作荷；龙毛《诗》如字，《大戴礼记》引作宠。句言蒙受天赐荣宠，何与龙用的是古字本义，荷与宠是后起今字。何与荷，龙与宠，皆为古今字关系异文。

七、联绵字关系型

所谓联绵字，也叫连绵词，是一种复音节的单纯词，一般是由两个字构成的，这两个字只起表音节的作用，不起表意义的作用，只有当它们联缀在一起时才构成一个单纯词，才能表达意义。由于这两个字原本就只是表音的，因而书写时更容易借用其他同音字或近音字，造成原有联绵字的变异，形成联绵字关系异文。这种异文互异双方都是联绵字，在一般情况下，一方是符合书写习惯的联绵字，另一方是同一联绵字的变异体。如《召南·羔羊》“委蛇委蛇”，毛《诗》如字作委蛇，齐《诗》韩《诗》作逶迤，就构成这种异文。其中齐韩用的是习惯写法，毛用的是变异体。

八、籀篆关系型

籀音宙，即大篆。篆指小篆。籀篆关系字属异体字范畴。异体字与通假字和古今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是同一个字，是字音字

义完全相同而只是形体不同的同一个字。根据异文双方内在联系矛盾的特殊性,我们把异体字关系异文分为籀篆关系、隶变关系和正俗关系三种类型来介绍。所谓籀篆关系异文,就是构成异文的一方是大篆体字,另一方是小篆体字。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后人用隶书或楷书写定的大篆体或小篆体的隶定字。《召南·江有汜》“其嘯也歌”,毛韩作嘯,鲁齐作歎。据《说文》,嘯是小篆体隶定字,歎是大篆体隶定字,那么这对异文无疑是属籀篆关系。

九、隶变关系型

这是异体字关系异文的第二类,是在汉字隶变基础上形成的。所谓隶变,包含两层意思:一般含义指汉字形体由篆书到隶书的演变过程;特殊含义指篆体汉字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区别于正体隶定字(符合小篆体笔画)的变体隶定字。不同的《诗经》传本和引用著作,有的用正体隶定字,有的用变体隶定字,就形成这种隶变关系异文。《魏风·葛屨》“是以为刺”,毛齐韩三家用的正体隶定字刺字,《汉石经·鲁诗》残碑用的变体隶定字刺字,构成的异文就属此型。

十、正俗关系型

这是异体字关系异文的第三类。正俗关系异体字与前两类异体字的区别在于:籀篆关系异体字形成于大篆向小篆演变过程中,隶定后体现为大篆正体隶定字与小篆正体隶定字的关系;隶变关系异体字形成于小篆向隶书演变过程中,隶定后体现为小篆正体隶定字与小篆变体隶定字的关系;正俗关系异体字则是由同一时代取得法定地位的正字与世俗乡间随意制造的别体俗字所构成的,所体现的正俗关系是可以发展变化的。正俗关系异文的一方是正体字,另一方是俗体字或曰或体字。《召南·摽有梅》“摽有梅”,毛作梅,韩作媒,就构成这类异文。毛用正体,韩用俗体。

十一、避讳致异型

顾名思义,这类异文是由于避讳改字而形成的。改的方法是用一个文义相通的字,代替犯忌讳的字。这类异文的一方是原字,另一方是改字。《小雅·小明》“无恒安息”,恒毛《诗》如字,述齐《诗》的《汉书》引作常。改恒为常,是为避汉文帝刘恒讳而形成的异文。《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无俾民忧”、“以民为逮”,诸民字毛今本皆如字,而敦煌唐写本《毛诗正义·大雅·民劳》残卷诸民字皆作人,民与人成异文。此又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然的。

十二、倒文致异型

这类异文是由于颠倒诗文次序而形成的。倒文的原因,可能是传写误倒,也可能是师承有自。正因为是倒文致异,所以与前述诸类异文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互异双方文字相同,只是次序不同。《小雅·楚茨》“鼓钟送尸”,毛今本作鼓钟,《宋书·乐志》两引作钟鼓,“鼓钟”与“钟鼓”成异文。《小雅·常棣》“宜尔室家”,毛今本作室家,而《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本作家室,“室家”与“家室”成异文。此皆倒文致异之例。

十三、衍夺致异型

衍是繁衍,在此指误添;夺是剥夺,在此指脱落。抄写引用者由于不慎误添或脱落文字,或者由于对原句理解错误师心自用随意增删文字,是衍夺致异的主要原因。与上述各类异文不同,此类异文互异双方不是一两个字,也不是一个单纯词或复合词,而是整个句子。说具体些,构成此类异文的一方为原诗句,另一方为衍字句或夺字句。《王风·丘中有麻》“将其来施施”,毛今本如句,《颜氏家训》谓毛古本作“将其来施”。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较可信理由证明毛今本衍施字。然则“将其来施施”与“将其来施”是构成衍字致异型异文。《召南·殷其雷》第二章第四句,毛今传本作“莫敢遑息”,《诗经考文》足利本作

“莫敢或遑息”。李富孙《诗经异文释》引他老师阮官保的话，以较可信理由认定毛今本脱或字。然则“莫敢遑息”与“莫敢或遑息”又构成夺字致异型异文。

十四、正讹关系型

正指正确，讹指错误。构成这类异文的两个字，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照理说把原文写错了，改过来就是了，不应再称异文。但我国古籍文字错讹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字是错讹还是通假不易区别，因之古人对此非常慎重，一般是议而不动，存而不改，这就使古籍文字错讹成为一种客观的复杂的并且往往有争议的文字现象。因此亦特立为一种类型而介绍之。《周南·汉广》首章“不可休息”，毛《诗》作息，韩《诗》作思，成异文。前人孔颖达、阮元等已根据《诗经》韵在辞上的文例，证明“息为思字之讹”。《陈风·墓门》二章“歌以讯之”，毛作讯，韩作谗，成异文。陈第、顾炎武、段玉裁、李富孙、陈乔枏等也已从《广韵》和《楚辞补注》的引文、徐邈《毛诗音》的音义以及押韵问题等三个方面，证明“讯为谗字之讹”。那么思与息，谗与讯，即属正讹关系异文。

《诗经》异文的十四个基本类型已简要介绍如上。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在前面是一个类型一个类型分开来介绍的，并且是把异文之间相互关系分解为两两相对的双边关系来解释的。这样讲有可能使人发生误解，好象《诗经》异文都是以这种单一类型双边关系形态存在着的。不是的。事实上，有些异文是以单一类型双边关系形态存在着的，有些异文又是以多种类型多边关系错综结合形态存在着的。但是不论多么错综复杂，都不外乎这十四种基本类型，只要把它们分解为两两相对的双边关系，抓住不同的形成原因和内在联系，掌握类型，找到本字，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诗经》异文研究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诗经》异文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毛《传》，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序》谓“非孰于《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读毛《传》”就是证明。从汉代毛《传》、郑《笺》，到唐代陆德明《毛诗释文》、孔颖达《毛诗正义》，宋代朱熹《诗集传》、王应麟《诗考》，再到清代黄位清《诗经异文录》、李富孙《诗经异文释》、陈乔枏《诗经四家异文考》、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再到现当代吴闿生《诗义会通》、黄焯《毛诗郑笺平议》和《诗疏平议》、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译注》、陈子展《诗经直解》、袁梅《诗经译注》等等，前后达两千年。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虽有的是专门研究《诗经》异文的书，有的不是，但都贯穿着一条《诗经》异文研究的连线，体现着《诗经》异文研究的成果。一种学术研究能有这样长的发展史，这本身就说明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需要。

《诗经》异文研究本身具有三个很可贵的品格：一个是古人用字习惯和规律研究的品格。这一点我们在本文开始时已提到。《诗经》异文是唐以前古人用字习惯、方式和规律的产物，因之对它的研究自然就意味着对唐以前古人用字习惯、方式和规律的探讨。再一个是比较研究的品格。《诗经》异文本身意味着一种双边乃至多边关系，因之对它的研究就必然贯穿着比较，本字与借字的比较，古字与今字的比较，毛《诗》用字与三家《诗》用字的比较，三家《诗》相互间用字的比较等等。《诗经》研究引进异文研究，就等于引进比较研究的方法和机制。第三个是本字本义研究的品格。通过相关异文的分析比较，区别本字借字、古字今字、原字改字、正字讹字，进而揭示本字本义，是《诗经》异文研究的必然取向，也

是题中之义。

由于《诗经》异文研究具有以上三个可贵品格,因而它不仅对于《诗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一般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单就《诗经》研究本身来讲,那么它不仅在诗经学发展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就是对今天的毛《诗》研究和三家《诗》研究,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看:

一、通故训路线

这里讲的故训,是指汉注,特别是指毛《传》。毛《传》奠定了毛《诗》训诂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到唐代又形成传、笺、疏三位一体的训诂体系。研究《诗经》的词义训诂不看毛《传》不行,不研究这个训诂体系也不行。但是,由于毛《传》行文简古,有些字词训释得虽然正确,却省略了中间环节,割断了被解释词与解释词之间的联系,因而到了后来或者难以被人理解,或者反而被人曲解,把问题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引进异文研究,那么相关异文在人们的分析比较中,往往能起中介作用,使毛《传》的训诂路线得以疏通,使问题迎刃而解。如《豳风·鸛鸣》“彻彼桑土”句。毛《传》:“桑土,桑根也。”讲得正确。但桑土为什么能解释成桑根?毛《传》没讲,郑《笺》也没讲。到孔颖达便产生曲解。《毛诗正义》说:“取彼桑土,用为鸟巢,明是桑根在土,剥取其皮,故知桑土即桑根也。”把桑土的土解释为土地的土,把桑土解释为桑根在土,明是望文生义。朱熹《诗集传》说:“桑土,桑根皮也。”增一字,退一步,还不如毛《传》原训准确。但清人陈奂、李富孙、马瑞辰等引进异文研究后,问题立刻明朗起来。因为毛《诗》的土字,韩《诗》作杜,杜和土构成异文,而扬雄《方言》谓“杜,根也。东齐曰杜”。因此他们通过比较,很快认清杜是本字,土是通假字,桑土即桑杜,因而可训桑根。这样就疏通了从桑土到桑杜再到桑根的训诂路线,对毛

《传》作到了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二、订古注谬失

这里说的古注,既包括汉代故训,也包括整个汉唐训诂体系,包括历代古注。历代古注的谬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汉代故训本来讲对了,但由于讲得简古,后人不好理解,反而曲解致误的;另一种是从一开始汉代故训就讲错了,由于简古后人长期难以识别,因而仍袭其误的。前一种如前述通过疏通故训路线即可顺带解决;后一种只要有异文,引进异文研究,有了相关异文与被解释词或解释词的比较,问题也会变得容易解决起来。比如《秦风·终南》二章“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句言终南山上有纪和堂。但纪和堂指什么?毛《传》:“纪,基也。堂,毕道平如堂也。”郑《笺》:“毕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毕,终南山之道名,边如堂之墙然。”孔颖达《毛诗正义》:“定本作纪,以下文有堂,故以为基,谓山基也。……以终南之山见有此堂,知是毕道之侧,其崖如堂也。”朱熹《诗集传》:“纪,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宽平处也。”简而言之,纪字之训,郑同毛,孔申毛,朱异孔;堂字之训,郑异毛,孔申郑,朱异郑孔。前人的解释被后人否定,谁的解释也不能服众,说明这两个字的训诂问题没解决好。而王引之在《经义述闻》“有纪有堂”条内引进异文研究,根据三家《诗》纪作杞、堂作棠的异文,加以分析比较,问题很快便获解决。王谓纪为杞之通假,堂为棠之通假,杞与棠是本字,指两种树。此训一出,当即服众。为什么?就因为正确。一是从古人用字规律看,纪和杞同韵,堂和棠同音,符合叠韵通假和同音通假要求;二是从全诗看,一章的“有条有梅”是讲有两种树,此训正好与之相对;三是从全书看,《诗经》中所有“山有△”、“山有△△”、“△山有△”句式,都是讲有植物,有树木花草,此训正合全书文例。这反过来又证明毛、郑、孔、朱旧注的谬失,说明异文研究在订正历代古注谬失方面的作用和意

义。

三、拓训诂思路

拓者,开拓也,拓展也。我们通过《诗经》异文研究,掌握古人用字习惯、方式和规律,就能拓展训诂思路,提高训诂水平,增强在训诂分歧面前判断择优或提出自己新见解的能力。即使没有异文的《诗经》用字训诂问题,也能触类旁通,使其得到较好解决。以掌握形省通假规律解决“不”字训诂问题为例。《诗经》中共用“不”字 617 个,分布在 166 首诗中,其中绝大多数是用作否定副词,但也有十来首诗的二十来个“不”字,如果看作否定副词就讲不通,且与诗的原意相反。如《小雅·车攻》“徒御不警,大庖不盈”两句,意思是周王打猎驭手很机警,野味打得多,佳肴满厨房。《大雅·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两句,意思是周朝功业很显赫,天帝之命很正确。《周颂·清庙》“不显不承”一句,意思是文王德行光明显耀,得到后人继承发扬。以上诸句皆为颂赞之词,若将六“不”字看作否定副词,便与原意背道而驰。

怎么办?这里没有异文,不能在与相关异文比较中作判断。为了讲得与诗的原意相合,清以前用了两个方法。毛《传》:“不警,警也。不盈,盈也。”又云:“不显,显也;显,光也。不时,时也;时,是也。”又云:“显于天矣,见承于人矣。”这是把“不”字看作无义语助词的方法。郑《笺》:“不警,警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又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又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与?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顺文王志意与?言其承顺之也。”这又是把“不”看作否定副词而把全句看作反问的方法。到清代开始有人使用第三个方法,把“不”看作“丕”的通假字。《说文》:“丕,大也。”大是褒词含有甚义,于是诸句皆通。三条训诂思路,三种解释方法,说明这是一个存在分歧而比较复杂的训诂问题。但由于我们理解和掌握

了形省通假的文字现象和用字规律,拓展了训诂思路,问题便变得容易起来。我们一看便知这是一个形省通假问题,“不”是“丕”的形省通假字,而本字本义被掩盖。这样我们在承认上述三种思路和方法可以并存的前提下,就可以很有自信地选择第三种思路和方法,并给这种思路和方法以较高评价。

四、助版本校勘

《诗经》研究不能没有版本校勘,这是人所共认的;而《诗经》版本的校勘,又不能离开异文研究。《诗经》版本校勘和《诗经》异文研究两者既不是一回事儿,又相辅相成。《诗经》版本校勘起着调查清理异文的作用,在客观上能为《诗经》异文研究打基础创条件;而异文研究又贯穿于《诗经》版本校勘的全过程,如果没有异文研究的参与和帮助,校勘工作就不能进行,校勘任务也不能完成。以专门为《毛诗注疏》本作校勘的阮元的《毛诗注疏校勘记》经文部分的校勘为例。如果我们具体认真地考察一下阮元所作的校勘记,就可以从中看出三个共同点:其一,校勘任务的提出,是由于不同版本间存在异文;其二,校勘记的主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是围绕异文所进行的考证和辨析;其三,校勘记的结论是明确的,这明确的结论正是对异文进行考证研究的结果。由此可见《诗经》异文研究在助版本校勘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五、辨著述家别

一种新发现的《诗经》版本属于哪一家?一种多次引用《诗经》的著作引用的是哪家《诗》说?这就是家别问题。辨家别对于诗学流派的研究,对各派各家师承关系和传习体系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对于三家《诗》研究中辑录佚文佚说的工作,也是前提条件。《诗经》异文研究所以能帮助我们辨识著述家别,是因为通过这种研究可以掌握鲁齐韩毛各家的用字特点和规律,而这种用字特点和规律往往就可成为辨识著述家别的重要标

志。比如《诗经》中使用的 266 个维字,通过异文研究发现,毛《诗》都作维,三家《诗》有时作唯,有时作惟,对这个字的使用便成为辨别毛《诗》和三家《诗》的标志。如果一种著作引用《诗经》的句子都作维,则可断定该著作用毛《诗》。如果又发现其个别地方用了唯或惟字,则可知道是传写之误。

再以辨识顾野王《玉篇》的述《诗》家别为例。陈乔枏在《韩诗遗说考》中,就是先根据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顾野王在南朝梁大同九年撰《玉篇》时三家仅存韩《诗》的历史背景,得出“《玉篇》所载《诗经》文字训义兼采韩毛二家”的初步结论,随即进行异文研究,考证《玉篇》引《诗》中不同于毛《诗》的异文,而证实其初步结论的。如《邶风·新台》“燕婉之求”,《玉篇》引作“嬾婉之求”,《玉篇》的嬾与毛《诗》的燕成异文。《大雅·旰》“皋门有伉”,《玉篇》引作“高门有闕”,《玉篇》的闕与毛《诗》的伉成异文。通过进一步的考证,知道《文选》注引韩《诗》燕作嬾,陆德明《毛诗释文》引韩《诗》伉作闕,这样便证明《玉篇》的“嬾婉之求”和“高门有闕”属韩《诗》佚文,同时也证明了《玉篇》兼采韩毛的述《诗》特点。经过反复的考辨证实,在以后辑佚中,《玉篇》引《诗》凡与毛不同者,即可作为韩《诗》佚文辑录。

六、显三家面貌

在三家《诗》研究中进行大量辑佚工作以

后,如何把所辑佚文加以著录表述,使三家《诗》的面貌尽可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以便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利用这笔诗学遗产,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前人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主要是两个:一个是顺序罗列法。就是把所辑得的佚文按照《诗经》的篇章顺序罗列记录下来,每条佚文后面注明出处。这种作法的代表是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鲁诗故》、《齐诗传》、《韩诗故》等等。这样作虽然吉光片羽,亦足珍贵,但总是支离散碎,难给人以明晰印象。

再一个是异文比较法。就是以毛《诗》为参照物,用异文比较方法著录表述三家佚文。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王氏《集疏》是历代三家《诗》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也是三家佚文比较完备的著录表述者。它的作法是逐篇过录毛《诗》原文,而将三家异文置于相关毛《诗》章句之下,并在随后注明异文出处引出三家佚文。以《集疏》中《周南·关雎》为例。该诗章句向有分歧,王氏主五章说,每章四句。异文七处:第一章第二句“在河之洲”下注明“三家洲作州”,第四句“君子好逑”下注明“鲁齐逑作仇”;第二章首句“参差荇菜”下注明“三家参作蓼,荇作蓂”;第三章末句“辗转反侧”下注明“三家辗作展”;第五章第二句“左右芼之”下注明“韩芼作猗”,末句“钟鼓乐之”下注明“韩钟鼓作鼓钟”。如果用图表来表示就是:

章次	句次	毛诗	鲁诗	齐诗	韩诗
第一章	第二句	在河之洲	在河之州	在河之州	在河之州
	末句	君子好逑	君子好仇	君子好仇	君子好逑
第二章	首句	参差荇菜	蓼差蓂菜	蓼差蓂菜	蓼差蓂菜
第三章	末句	辗转反侧	展转反侧	展转反侧	展转反侧
第五章	第二句	左右芼之	左右芼之	左右芼之	左右猗之
	末句	钟鼓乐之	钟鼓乐之	钟鼓乐之	鼓钟乐之

我们假定凡是没有发现异文的诗句三家《诗》与毛《诗》是相同的，又有了三家《诗》与毛《诗》异文的比较，三家《诗》佚文与毛《诗》相关诗句的比较，三家《诗》的面貌不是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吗？

《诗经》异文研究的意义归根结底取决于《诗经》研究的意义，而《诗经》创作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产生于我国早期社会意

识形态部门尚未细致分工的时期，这一点决定了《诗经》既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一部经典文献，是带有很大综合性的文献资源和具有丰富信息量的信息资源。随着对《诗经》深层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对本字本文的要求，对毛《诗》研究与三家《诗》研究相结合互补效益的追求，将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在这方面《诗经》异文研究无疑能大显身手。

〔作者简介〕 张树波，1936年生。1966年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发表过专著《国风集说》等。

赵令时的生年

■ 孔凡礼

宋代词人赵令时的生年，沿袭着一种错误的说法，这就是《全宋词》第一册第491页《赵令时小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和《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中的《赵令时》条的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说。

那么，他究竟生于哪一年呢？

李廌《济南集》卷三《赵德麟中秋生日》云：“治平初年岁执徐，越王国邸生英儒。”据《尔雅》卷六，太岁在辰曰“执徐”。结合《宋史》，知令时生于宋英宗治平元年甲辰（1064）八月十五日（合太阳历为九月二十八日）。

赵令时是宋太祖次子燕懿王德昭玄孙。德昭，《宋史》卷244有传，卒后封越王。故《济南集》说“越王国邸”。据《宋史》卷218《宗室世系表》9，令时有兄令率、令珣。据黄芨《山谷年谱》，熙宁五年（1072）至元丰三年（1080），黄庭坚（鲁直）为北京国子监教授。令时所撰《侯鯖录》卷二云：“熙宁中，鲁直入宫教余兄弟。”

《宋史》卷85《地理志》1：“庆历二年，建大名府为北京。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驻蹕行宫。“知令时兄弟其时居北京宫中。明汪砢玉《珊瑚网》卷5《山谷楷书赵景道帖》：“往余与公寿景珍游，时景道方为儿童嬉戏，今欣然在朝班，思公寿景珍不得见，每见景道，尚有典型。”帖作於元祐间。

《山谷年谱》熙宁五年著录庭坚《次韵景珍醢醢》诗，谓景珍名令蟾。《宋史·宗室世系表》有令蟾之名，与令时为堂兄弟，而令时原字景颙。《山谷外集诗注》卷2有《以金沙醢醢送公寿》、《寄怀公寿》二诗，次熙宁五年，作於北京。前者注文引庭坚自跋：“余与宗室越宫有葭莩。”“越宫”当即以上所云“越王国邸”，即令时兄弟等所居之宫。令时即出生于北京。庭坚跋云曩时与“公寿景珍尝共文酒之乐”，公寿当亦为宗室。庭坚与越王宫中关系很密切，入宫教令时兄弟以此。

上引《山谷楷书赵景道帖》后，尚附有令时的友人温革的跋。跋叙因赵昌叔得见庭坚所书赵景道帖等，并谓景道乃令时之兄而昌叔乃令时之侄。考《宋史·宗室世系表》，令珣无后，知景道乃令率之字。

以上所述，皆令时生于治平元年之有力旁证，而皇祐三年说不可信。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6《送赵令时之官陈州……》，作于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诗有“青云计自此时始”之句，贺其初入仕。与以上叙述亦合。